

作為媒介的酒店

——淺水灣酒店的空間功能演變與香港歷史記憶

方詩敏 * 吳余勁 ** 張少鵬 ***

摘要 從1920年詹姆斯·塔加特領頭興建香港淺水灣酒店至淺水灣酒店原址被改建成住宅區的現在，淺水灣酒店從原有的一個供人休憩、交際的物質實體空間，逐步轉變成香港歷史記憶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本文以德佈雷（Régis Debray）的傳承（Transmission）概念為核心，以香港淺水灣酒店為研究對象，藉助歷史檔案材料以及田野調查，關注作為“記憶之場”的淺水灣酒店在不同時間維度上的媒介實踐空間的物質功能特性、象徵意義及在其中進行的社會實踐，最終轉化成香港歷史記憶載體的歷程。

關鍵詞 媒介記憶；媒介空間；淺水灣酒店；香港歷史記憶

酒店（Hotel），顧名思義即是“喝酒的地方”或者是“賣酒的場所”，後來由於時間的推移、社會的進步，逐步成為讓旅行者進行短期休息或住宿的一類地方的統稱；“驛站”“旅館”也偶爾成為“酒店”的替代詞，指稱這一類提供“短期休息或住宿”的空間，儘管在現代社會中，“驛站”“旅館”“酒店”等有一種隱性的高低等級以及功能性之分。毫無疑問，對於一座現代化城市，尤其是旅遊城市而言，酒店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酒店的出現為容納外來旅行者的短期休息與住宿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基本物質條件，從而避免了外來旅行者無處可去的事情發生。

現代酒店的出現為各類交際活動創造了相對應的物質空間和物質條件，具有某些特色的酒店設施甚至可以成為城市的名片，成為容納城市居民的集體記憶的容器，為城市生活增添了別樣的色彩。酒店本身可以作為各類人際交流（Communication）的基本場所之一，某

些類型的交流活動也往往選擇在酒店舉行，例如各類大型會議、新聞發佈會等——酒店為這些人際交流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活動空間，自身附帶的休息與住宿功能也為這類活動提供了基礎的保障，從而使得人與人之間實現真正的時空意義上的面對面互動，某種程度上這和橋樑的“交流功能”極為相似：

橋以多重方式伴送人們。城裡的橋從城堡通向教堂廣場，鄉鎮的橋把車水馬龍帶向周圍的村子。水溪上毫不起眼的石板橋為豐收的車隊提供了從田野到村子的通道，承荷着從鄉間小路到公路的伐木車輛。高速公路上的橋被編織入進行計算的、盡可能快的長途交通的網路中。¹

有學者指出：“實體空間的特定場景，不僅提供了人們進行公共交往的平台，而且構築了城市居民的集體記憶和地方感，這種嵌入日常生活場景的實體媒介，對於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²這正如約翰·杜海姆·彼得斯指出的那樣：“只有我們在將傳播（交通）不止理解為訊息發送時——當然發送訊息是媒介極為重要的功能——也將其視作為使用者創

* 方詩敏，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 吳余勁，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 張少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圖 1. 約 1925 年的淺水灣酒店全貌（圖片來源：“香港記憶”網站，筆者複製提供。）

造的生存條件（Condition for Existence）時，媒介就不再僅僅是演播室、廣播站、訊息和頻道，同時也成了基礎設施和生命形態。”³也即是說，“媒介從‘訊息’層面拓展到‘棲息’（Habitats）層面”。⁴至此，將“酒店”視為一種實際存在的空間媒介便有了其合理性，“所有媒介都非表意，它們本身即存有”。⁵當然，酒店和橋樑作為使用者創造的生存條件之“實體存在”，功能性也有不同——橋樑本質上是作為一種交流的“通道”（Channel），而酒店則是作為一個綜合性的交流“節點”（Port），功能性質的面向上有較大不同。

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對象是香港淺水灣酒店，選擇該酒店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該酒店作為媒介記憶空間的獨特性：酒店建成之初並非作為對某一特定事件的紀念場所，而是隨着經濟發展、社會代際更替與統治權力的更迭使得其自身的空間功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而在不同時間段成為不同的香港歷史記憶的載體。記憶使得過去與現在產生了連續性，但是記憶本身作為一種無形之物，需要一些物質載體或者特定的空間進行承載或呈現，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將“空間與集體記憶”當做一個基本問題，⁶澤利澤（Barbie Zelizer）指出“記憶總是被錨定在特定的空間之中，通過特定的紀念物來表達與再現”⁷，這就是諾拉（Pierre Nora）所言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它可以是抽象的觀念，也可以是具體的空間場所。⁸本文以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傳承（Transmission）⁹概念為核心，藉助歷史檔案材料以及田野調查，以香港淺水灣酒店這一具體的空間場所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在不同時間維度上酒店作為媒介實踐空間的不同功能與內涵，重點關注作為“記憶之場”的淺水灣酒店在不同時間維度的物質特性、象徵意義及在其中進行的社會實踐。具

港澳雜談

體而言，本文擬研究以下問題：作為媒介的淺水灣酒店的誕生原因是甚麼？淺水灣酒店建成之初發揮了何種媒介空間功能？隨着時間的推移，酒店本身的實體存在和媒介功能出現了何種變化？

一、最初的淺水灣酒店： 作為實體居住與交際空間（1921—1941）

淺水灣酒店地處香港島南部地區（簡稱“港島南區”或者“南區”），東起大浪灣，西起薄扶林，當中包括香港仔、鴨脷洲、鋼線灣、黃竹坑、壽臣山、深水灣、淺水灣、赤柱、春坎角、大潭及石澳等地（圖1）¹⁰。二十世紀初期，香港島南部地區地理位置偏僻、人煙稀少，但是詹姆斯·塔加特（James Taggart）注意到淺水灣的海水清澈、沙灘乾淨，若是建立一座酒店，則可以要求當時的政府在周邊興建道路以連通香港島北部的核心區域。於是，塔加特與當時的香港總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達成一份協議，前者準備在淺水灣新建一座酒店，而當時的香港政府則將興建淺水灣道以及黃泥湧峽道，以連接這一酒店。1920年，香港淺水灣酒店建成。次年，該酒店地下車庫建成，開始迎來大量的訪客。

最佳例子就是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941年2月，海明威與第三任妻子馬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訪問香港，之後更遠赴韶關、桂林等地報導二戰中中國戰區的戰況。海明威返回美國後接受採訪時回憶道：

我們問海明威：香港像甚麼樣子？他說，只要香港變得這麼極端腐朽，它隨時都面臨着危險。人們已完全適應了緊張的氣氛。他說，整個城市生活放蕩。英國各個殖民地的穩地因素就是英國女人。她們使生活保持正常。可她們被疏散到各處，一般來說，情緒是高的，但道德水準很低。

……食品是充足而良好的。香港擁有幾家世界上最好的餐館，西式的和中式的都有。還有賽馬、板球、橄欖球和英國足球。¹¹

顯然，最初的淺水灣酒店為當時居住在香港的上流社會提供了生活、休閒與消費的空間。

第一，淺水灣酒店的入住費用是一般平民享受不起的，因為平時的生活負擔已經佔據了絕大部分收入，“每人每月食物支出5.4至6港元，房租3元／每床位（收入少時露宿街頭），衣服1港元，其他2港元……每人每月最低費用為不租床9港元，租床12港元……30港元是一個三口工人之家的每月支出底線。”¹²

第二，淺水灣酒店所在的香港島南區係所謂的“富人區”，劉蜀永引何東撰寫的《香港華人》一文指出：

除山頂區之外，富有華人家庭擁有並居住在港島某些最大最好的物業中，其生活標準有了很大的提高。無論是衣着服飾方面，還是在居家物質享受方面，他們都沉溺於歐式的奢華之中。¹³

文中“山頂區”即香港島南區的一部分，位處於現在的太平山頂。在這種條件下，淺水灣酒店的建設不可能以一種“貧民窟”的狀態出現，必須與周邊的區域建築風格相一致，以至於學者舒新城訪問香港時覺得淺水灣酒店的內部裝潢“設備堂皇，有類宮殿”，甚至指出淺水灣酒店“今年獨特別廉價者，以香港政府去年命令其人民及婦孺疏散……因而住客特少，故特別減價……國人來居者仍極少”¹⁴，這種“廉價”乃當時香港普羅大眾所消費不起。

第三，淺水灣酒店地處位置有成為獨特交際空間的“潛力”，《舒新城日記》記載：

遠在市背數十里，依山臨海，有如鄉

野，雖設備甚佳，但非習靜之人則覺其過於寂靜而不能享此清福也……實一幅天然圖畫也。¹⁵

最終，淺水灣酒店成為了舒新城所指“西方之一切設施與享樂亦均移植於此”¹⁶的代表物，同時成為一種法國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的“資本（Capital）”的象徵物，即當時的高端生活的象徵空間表徵與高端人士的代名詞，背後是社會資本——酒店及這些人士本身帶來的制度性關係的堅固人際網路資源及其實際、潛在人際資源的總和，同時也是象徵資本——這些高端人士的個人聲望、權威與信譽等內在的“表現”空間；與此同時，淺水灣同時還發揮着交際空間功能，吸引了眾多名人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歐內斯特·海明威等，他們都曾在此下榻並會見來訪者——這也為他們的象徵資本提供了表現空間。在1941年日本軍隊入侵香港以前，淺水灣酒店維持着實體居住與交際空間的功能。

二、戰火及以後：從實體空間到空間“想像”與“再造”（1941—1989）

1941年12月，日軍入侵香港。淺水灣酒店躲藏了大量的平民及英國軍隊成員。到12月22日上午10時，日軍第229聯隊（Regiment）第10中隊（Company）佔領在淺水灣海灘以西的別墅，切斷淺水灣道的東西交通，在香港島的英軍自此被分割成東西兩部。至於淺水灣酒店，因食水斷絕，英軍指揮官華里士（Cedric Wallis）建議酒店內的婦孺離開，但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蕭士（Andrew L. Shields）作出勸告，他稱住客離開酒店後將無處可逃，反建議守軍撤出酒店，讓住客留下投降。華里士考慮到婦孺的安危後同意撤軍，守軍於晚上10時撤出酒店，允許住客向日軍投降。淺水灣酒店於22日深夜被日軍第229聯隊第3大隊（Battalion）佔領。¹⁷在佔領淺水灣酒店後，日本軍隊將其作為醫院及營房，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為止。

1939年，作家張愛玲常到淺水灣酒店看望母親，香港淪陷後她還常常步行到淺水灣酒店探聽開往上海的船期，¹⁸淺水灣酒店也是她以淪陷時期的香港為地理背景寫就的小說《傾城之戀》之重要場景。小說講述了來自上海的白家小姐白流蘇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後偶然認識了多金瀟灑的單身漢范柳原，便拿自己當做賭注，遠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愛情，企圖爭取一個合法的婚姻地位。兩個情場高手“鬥法”的場地就在淺水灣飯店，原本白流蘇似要服輸了，但在范柳原即將離開香港時，日軍開始轟炸淺水灣。最終在日軍狂轟濫炸，生死交關之際，范柳原折回保護白流蘇，白流蘇在欣喜中也不無悲哀。

在小說中，白流蘇跟着徐太太乘船至香港，下了碼頭便下榻淺水灣飯店：

上了岸，叫了兩部汽車到淺水灣飯店。那車駛出了鬧市，翻山越嶺，走了多時，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漏出藍綠色的海。近了淺水灣，一樣是土崖與叢林，卻漸漸的明媚起來。¹⁹

淺水灣酒店充滿殖民地英式風情的標誌性露台餐廳“The Verandah”（圖2）²⁰在張愛玲筆下直接作為小說男女主角邂逅的場景。

他們在餐廳外面的走廊上撿了個桌子坐下，石欄外生着高大的棕櫚樹，那絲絲縷縷披散着的葉子在太陽光裡微微發抖，像光亮的噴泉。樹底下也有噴水池子，可沒有那麼偉麗。²¹

“淡白的汨汨吞吐淡黃的沙。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藍色。”²²作家的寥寥數字為讀者勾勒出具象化的淺水灣圖景，許多人也正是通過《傾城之戀》的文本而認識淺水灣酒店。²³小說的塑造成功將淺水灣酒店由物質性的空間媒介，轉換成給予受眾想像的抽象藝術空間。此外，1955年好萊塢電影《生死戀》（Love

港澳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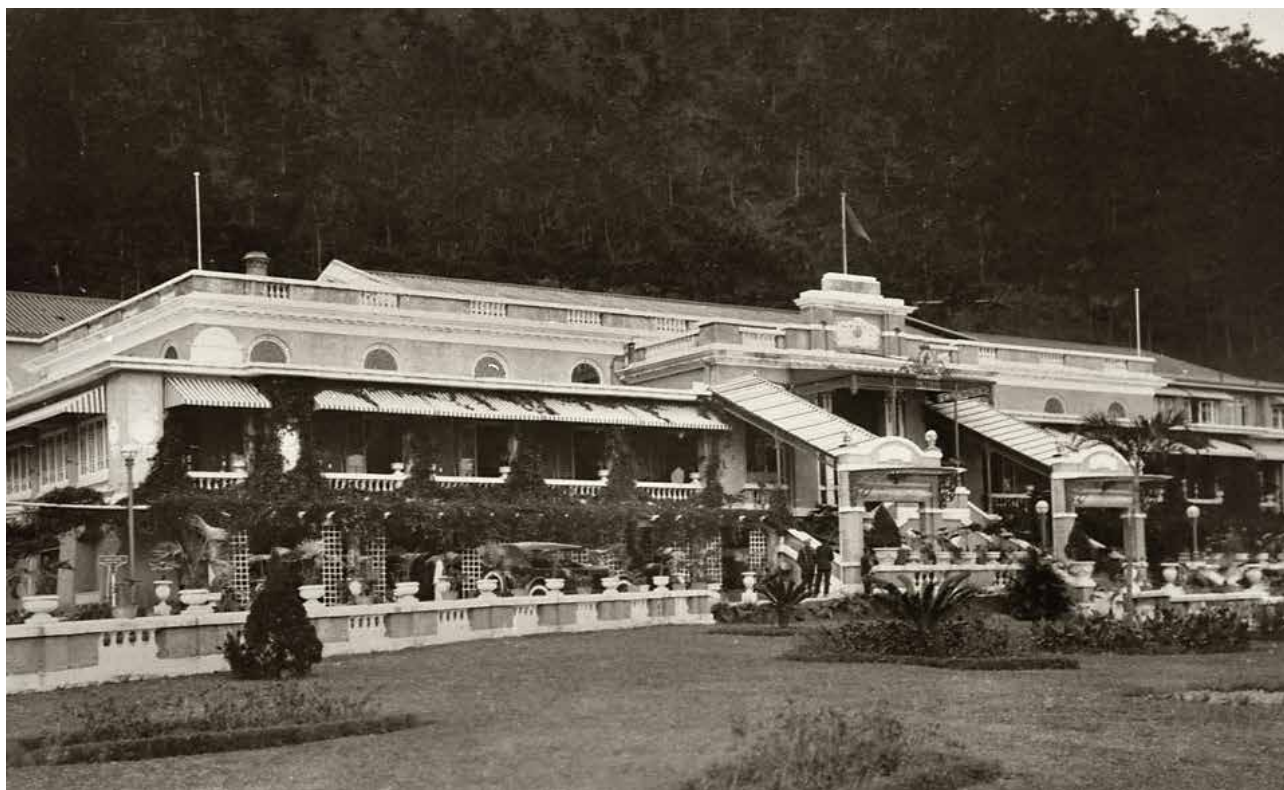


圖 2. 約 1930 年的充滿殖民地風情的淺水灣露台餐廳外觀（圖片來源：“香港記憶”網站，筆者複製提供。）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 更是將這種虛擬的抽象藝術空間想像，轉換為更為具象化的視覺想像——淺水灣酒店首次在電影中登場，作為電影化的視覺藝術空間展現在觀眾眼前。

1982 年，淺水灣酒店拆卸重建，僅保留了露台餐廳。1984 年，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同年根據張愛玲原著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傾城之戀》上映，影片裡的香港戰事突變與現實中香港主權歸位產生了重疊，香港這一主體在兩種時間意識中的膠着與抗衡，在現實中的淺水灣酒店拆遷中得到了凸顯。此時，淺水灣酒店的實體空間已經消失，但是許鞍華導演的電影《傾城之戀》則是將已經消失的物質性媒介空間挪用到邵氏影片的片場進行重建，由此將張愛玲的虛擬藝術空間想像轉化為視覺想像，同時又進行了空間“再造”。淺

水灣酒店則從原來的高端表徵與承擔交際功能的空間，逐步讓位給受眾對於酒店的“想像”，成為了一個“記憶之場”。

三、功能的轉換與歷史記憶的保留： 1989 年至今

1989 年，淺水灣酒店重建完成，它保留了因《傾城之戀》出名的露台餐廳，並改名為“影灣園”。其後，香港南區區議會從 2010 年開始籌劃“南區文學徑”，主要以一眾文學家曾在該區留下的足跡，來構築一系列文學地標。淺水灣酒店則是文學地圖中“張愛玲香港之旅”最重要的落點。如今，在“淺水灣酒店”這一符號上，地理的空間與文學的意象邁向更深的交織。酒店原址大部分被改建成小型住宅區、俱樂部、酒店式住宅、商場等建築物，其中作為影灣園主體部分的四座高層住宅，分別

以“de Ricou”“Taggart”“Harston”及“Nicholson”這四位淺水灣酒店的先驅命名，使得影灣園本身變成了一個充滿矛盾的空間，香港本土作家心猿曾評論道：

你要找《傾城之戀》裡白流蘇那面牆？你找到淺水灣，依稀有那么一個海灘，但那已不是原來的海灘，依稀有那么一個酒店，但已不是原來的酒店，是那酒店再生的類像。你以為還有那麼地老天荒的一面牆？不，那面牆早已不是那面牆了。²⁴

一方面，影灣園的基礎設施建設決定了民眾的“在場”：這一空間連結了民眾的生活，已經變成了民眾日常衣食住行的重要活動空間——保留下來的露台餐廳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淺水灣酒店的餐飲功能，但是這一功能被賦予了在此生活的民眾而非原來的高端人士；住宅、商場的存在滿足了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這是淺水灣酒店原功能所不具備的，而新建的酒店則取代了原有的酒店功能。至此，淺水灣酒店原來的高端表徵、交際空間與藝術想像空間等歷史空間逐步“退場”。

然而，對於露台餐廳的保留，乃至於以四位淺水灣酒店先驅命名的住宅無不提醒着受眾對香港過往歷史空間的追憶——影灣園之後建立了“淺水灣酒店歷史珍藏館”，將前述的歷史空間進行“濃縮”，是對於這種追憶的一個註腳。這一具備博物館性質的空間濃縮了淺水灣酒店從最初建立到如今的發展狀況，並將這一發展階段內的相關文物進行集中陳列，本質上加強了所謂“記憶之場”的功能，將淺水灣酒店的所有功能就此集中於一處展現出來。

毫無疑問，淺水灣酒店媒介空間功能的轉換意味着外在的經濟、社會發展（歷史）的變化。最初高端交際空間的出現，代表了香港社會經濟的最初萌芽與文化發展；而在日軍入侵之後，酒店功能的轉變意味着香港作為被佔領地；戰爭期間張愛玲的小說和其後兩部電影

的出現，則是將實體空間轉化成虛擬的藝術想像空間，從而將淺水灣酒店轉換成了“記憶之場”，淺水灣酒店原有的功能也逐步退化，直到重建以後；而重建之後的酒店原址功能已經不能和原來相比，但是仍有一個小的空間保留着對原有酒店功能的展示，這種展示行為代表了原有酒店媒介功能的消失，但也意味着現代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史已經走向了一個繁華的時代。

註釋：

1. [德]馬丁·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演講與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161頁。
2. 孫瑋：《作為媒介的城市：傳播意義再闡釋》，《新聞大學》2012年2月，第41-47頁。
3. [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著，鄧建國譯：《奇雲：媒介即存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7頁。
4. [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著，鄧建國譯：《奇雲：媒介即存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7頁。
5. [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著，鄧建國譯：《奇雲：媒介即存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7頁。
6.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0, pp. 128-157.
7. Barbie Zelizer,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2, no. 2 (1995), pp. 214-239.
8.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vol. 26 (1989), pp. 7-24.
9. Régis Debray, *Media Manifestos: On the Technologic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orms*, trans. by Eric Rauth, London: Verso, 1996, pp. 26-40.
10. 圖片為《淺水灣酒店（1）》，引自“香港記憶”網站，編號110，約1925年，參見 http://www.hkmemory.org/postcard/record.php?subject=architecture&lang=cht&acc_no=110，2021年9月20日。
11. 楊仁敬：《海明威在中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

港澳雜談

第 59–60 頁。

12. 轉引自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2016 年，第 235 頁。
13. 轉引自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2016 年，第 235–236 頁。
14. 舒新城：《舒新城日記》，1941 年 4 月 3 日，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第 353–360 頁。
15. 舒新城：《舒新城日記》，1941 年 4 月 3 日，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第 353–360 頁。
16. 舒新城：《舒新城日記》，1941 年 4 月 3 日，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第 353–360 頁。
17. 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3 年，第 268–269、271 頁。
18. 張愛玲：《回顧〈傾城之戀〉》，《明報》1984 年 8 月 3 日，

D5 版。

19. 張愛玲：《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第 174 頁。
20. 圖片為《淺水灣酒店 (2)》，引自“香港記憶”網站，編號 111，約 1930 年，參見 http://www.hkmemory.org/postcard/record.php?subject=architecture&lang=cht&acc_no=111，2021 年 9 月 20 日。
21. 張愛玲：《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第 182 頁。
22. 張愛玲：《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第 188 頁。
23. 小思：《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 185 頁。
24. 心猿：《狂城亂馬》，香港：青文書屋，1996 年，第 96 頁。

